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如何破？

代表们支招：企业提供更精准服务，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大学生自身也应提前做好更多准备……

思想众筹

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将达到23万，再创历史新高。一边是大学呼吁解决就业难，另一头企业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如何解决供需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上海两会上，来自高校、人力资源企业等市人大代表展开“头脑风暴”。

向结构性就业转变

“这几年疫情对就业市场的确有不小影响，随着防疫政策的变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慢慢复苏。”市人大代表、上海外服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惟清表示，企业要在赛道上取得优势，首先考虑的仍是招募优秀人才。她告诉记者，在这次两会上，许多代表的发言都离不开人才，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仍很大，预计今年将逐渐出现上

升趋势。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她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上海外服等综合性就业平台的作用，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将各方的信息有效对接，尤其是把用人单位的需求有效传递到位，为大学生就业提供适配性的岗位，让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矛盾”转为“结构性就业”。

其次，作为大学生自身，也要学会做一个“聪明”的就业者，主动为就业做结构性准备。“迈入大学时候的热门专业，在毕业迈出校门时，社会需要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翟惟清建议，如果就读的专业本身就是热门专业，一定要在这个领域中做精做强。如果就读一个相对冷僻的领域也不用悲观，可以跨前一步，跨专业选修其他学科专业，将自己培养为“跨界”人才。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可以多学习和职业目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实践能力，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往往更受市场青睐。

产教融合需“婚姻法”

“两会期间，不少代表都在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有的企业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让我们必须反思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教育改革，那就是产教融合，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供给侧方面深化改革。”市人大代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俞涛认为，大学必须根据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但如果企业、产业、行业和学校没有互动，学校不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人才，供需难以有效匹配。就好比说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如果不知道企业需要解决什么，那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高校的五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都需要去了解企业、产业、行业的需求。“因此产教融合对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像结婚，婚前大家都意识到产教融合非常重要，但

结婚后不在一条路上貌合神离。表面上是结婚了，但大家的关系是物理反应，没有发生化学反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俞涛建议，上海应该率先地方立法保障产教融合，它好比是产教融合的“婚姻法”，结婚了就得到法律保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能够发挥几方面作用：对于愿意积极参与的企业和高校，通过法律保障，起到鼓励产教融合的作用。还没意识到产教融合重要性的企业高校，能推动其加速产教融合。同时，产教融合开始后，政府还可以出台一些精准的政策，促进其深度融合。

在俞涛看来，立法后可以发挥监督作用，做得好的有所鼓励，做得不够好的也给予鞭策。“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过程中，要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真正发挥促进城市发展的作用，高校就有生命力，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能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路口右转有红灯为啥没绿灯？

代表建言城市精细化治理也需有用户思维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年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准备了一个关于上海市十字路口的右转红灯规范设置的建议，这个问题他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他说，大部分路口车辆右转都没有交通灯，但一些路口右转设置了红灯，但没有黄灯和绿灯，这可能导致车辆急停而发生交通事故，也会导致新手司机无所适从，停在路口“傻等”。关于右转交通灯要不要加绿灯黄灯，陆雷代表的想法

很坚决。

他认为，设置右转红灯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它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体现。但是，设置红灯的同时就应该设置黄灯和绿灯。同样，黄灯和绿灯是提醒驾驶人员整个灯即将变化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当然这会增加我们的城市治理成本，可能在线路上和投入上都会增加。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站在人民生命安全的立场来思考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好。”陆雷代表说。

记者从一位交警处了解到，因为右转是默认有路权的，正常情况下右转不影响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所以只在禁止通行的时候亮红灯。这和直行及左转不同，通过红绿灯交替给予不同方向的车辆不同的路权，避免发生通行冲突。

对此，陆雷代表表示，希望更多从用户使用习惯看，城市精细化治理需要有用户思维，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代表手记

代表提的建议能落实吗？

昨天上午是市人代会举办期间代表提交建议截止的时间。虽然并不存在“看哪个区代表团写得最多”的比赛，但是大家总是不免有点好胜心，纷纷抓紧时间提交建议。今年推出的《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雏形”就出自静安代表团。

建议基本是“一事一议”，标题就是一句话观点。文章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现实生活中亟待改善的问题；第二部分则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我提的《有关数字电视中增加“适老化套餐”的建议》为例，第一部分指出当前买个国产电视机回家，往往看不到电视节目，只有各种收费套餐，而喜欢看电视机大屏幕的老人，想看央视春晚、东方卫视春晚都找不到。这类电视机以技术“屏蔽”了免费的、优质的国有电视台内容，也“剥夺”了老年人在家看大屏电视的便利。第二部分提出建议，国产电视可以在出厂时植入相关应用，但是必须同时植入“适老化套餐”，可以适当收取低于市场价、约莫几百元的年费，让老年人“一目了然”“一键找到”。今后，还可以适当植入为老年人服务的内容。

代表建议能落实的前提是——提得符合实际情况、涉及最广大群众利益，且有相应的委办局可以分办。如果提的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怕是没有相匹配的政府机构可以“接招”；如果提的是国家层面的问题，那么上海市就无法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建议尤其是议案内容，必须符合“上位法”——亦即国家层面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有代表问：“‘无障碍条例’里罚款1万至3万元的标准是什么？”市人大法工委的同志解释，是根据“上位法”——国家正在制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法律法规里的标准确立的，但目前这一版刚过一审……上海先行了一步。

纸面上的代表建议最终是可以闭环的。但实际情况就要看相关委办局的落实力度。这也就是有些建议乃至议案提了多年，但推进速度不快的道理之一。代表是可以365天，天天提交建议的……

市人大代表 朱光（新民晚报记者）

委员呼吁提高建言质量

聚焦关键 发声要有预见性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在我国，协商渠道是多种的，但专门协商机构只有一个，就是人民政协，这赋予了人民政协更大更多更高的建言协商职责。”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在参加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时表示，委员一定要靠前站位，未雨绸缪；要在宏观政策出台前有预见性地发声。要围绕党政关切、民生关注，聚焦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用事实、数据讲人话、讲实话、讲真话，形成有血有肉的协商议政成果。

胡卫委员认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一定要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视野中去加强和改进。在他看来，在政协平台上，党和政府要广开言路，创设“有话敢在政协说，有话能在政协说”的环境；还要帮助委员知情明政，获得信息、协调关系、畅通渠道。“委员发声要做到言之有物、有据、有理；态度诚恳，意见明确，道理清楚，办法管用。真正做到建言、协商在决策之前。”胡卫委员表示，“不能只关注建言和提案数量，更要

关心提案质量、关注建言和提案是否能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事后诸葛亮，或仅陶醉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正是我们委员和政协机构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两会影话

拿出专业本领 奉献法治上海

“20年间，从5人到19人，阿拉律师代表一直在增加啊！”金纓代表（左）报出数字，李向农代表（中）和姚海嵩代表（右）频频点头。

20年间，从市十二届人大到市十六届人大，上海执业律师当选市人大代表的人数，逐届增长。三位律师代表身后，世博中心红厅外的背景板上，“爱上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律师代表们的心愿是——恪尽职责，拿出专业本领，奉献法治上海！

本报记者 刘歆 姚丽萍 摄影报道